【書文評介】

作者：黃華珍

書名：《日藏漢籍研究——以宋元版為中心》

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326 頁。

ISBN：978-7-101-09230-1

林佑澤 *

目次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歷史的回顧
　第一節　中日兩國社會發展情況比較
　第二節　中國古籍的東傳及其影響
　第三節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啟示
第二章 宋元版在日本的流布
　第一節　宋元時代的出版事業
　第二節　脅然等人的事迹及其貢獻
　第三節　宋元版東傳的軌迹
第三章 宋元版在日本的藏存
　第一節　日藏宋元版概說
　第二節　日藏宋元版舉例
　第三節　日藏宋元版保存單位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四章 日藏宋元版的地位及其影響
第一節 宋元版在日本的地位和研究
第二節 日本複刻、複印宋元版舉例
第三節 宋元版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結語
附錄
一 日藏宋版圖書提要
二 日藏元版圖書提要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本書作者黃華珍（1949-）祖居廣東揭西。於 1995 年取得日本二松學舍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學位後，遂出任該校東洋學研究所研究員，至 1997 年則進入日本岐阜聖德學園大學外國語學部擔當教職，現今為該單位所屬教授，以中國思想史、中日比較文化、客家文化為主要研究方向。而所撰《日藏宋本莊子音義》、《莊子音義の研究》、《日本奈良興福寺藏兩種古鈔本研究》皆於一定程度顯現出作者對日藏漢籍之留意程度，尤其本書更將焦點匯聚至日藏漢籍中關於宋元版本之考察，得以窺知作者意欲通盤式進行總覽之企圖。

日藏宋元版漢籍為數不少，尚且有待學者之大規模系統化整建，對此，不妨進一步設想，倘若可將國內外漢籍之各種版本與藏存單位悉數羅列於書目之下，使人一目瞭然，從而迅速取得對研究基礎之充分掌握，如此，無論是版本學或校讎學以至於文學之研究，勢必皆能獲益匪淺。然而，當前之發展進程大致仍舊處於小範圍之清點整理階段，儘管學界已對域外漢籍有所關注，但認識之視野有限，且不夠普遍；本書作者則以橫跨中日之學者身分對日藏漢籍——尤其是宋元版——進行提綱挈領式之觀察，自中日交流之歷史背景談起，同時闡述隋唐以前漢籍東傳之概況與引發之效應，然後將焦點移轉至宋元版漢籍於日本之流布情形，並介紹現今日本宋元版漢籍之藏存狀況與單位，接著說明日本關於宋元版漢籍之重要研究成果，兼對日藏宋元版漢籍之地位與影響作出評價，復收錄有逾三百筆日藏宋元版漢籍之初步考察內容，誠可謂包羅萬象。由是觀之，本書著實足以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個進入之契機，亦為不同面向之觀察開啟諸多可能，相信將有助於進一步喚起學者對域外漢籍之重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本上，本書可以分別為兩大區塊：一是董理隋唐時期以前漢籍東傳日本之情形，即第一章之論述核心；一是探析宋元版漢籍於日本之流布、藏存、研究、地位、影響，乃第二、三、四章之關注焦點。實則，本書堪稱專為元代以前日藏漢籍概況所進行之總覽性耙梳。尤其宋元版漢籍年代久遠而存世量少，無所避免於殘缺或逸失之意外；如此，域外宋元版漢籍便彌足珍貴。由是觀之，亦得以理解作者以宋元版為中心之用意。

作者於〈自序〉遂開宗明義指陳通過對漢籍東傳細節之觀察，將有益於思想影響、文化交流、比較文化三方面研究之進一步拓展。自古以降，中日互動頻繁且關係密切，的確深具開發跨國研究之潛力與價值，而作者則是以日藏漢籍為鎖匙，冀能導引學者藉此以延伸研究視野，開啟更多可能。

〈緒論〉則特別對漢籍能傳播四方之要素——印刷術之發展——進行闡述，藉此穩固研究基礎。首先，作者意圖釐清中國雕版印刷術之發生年代，除相關文獻外，亦羅列不少出土文物以為證據，同時引述張秀民、尾崎康、神田喜一郎、米山寅太郎等學者之見解，遂將發生之年代限縮於唐代初期。其次，乃是關於漢籍印刷史之精簡說明，謂雕版印刷術至五代時期之運用業已相當頻繁，進入宋代亦不斷有所改良；元代儘管出現朱墨兩色套印之技術，且傳承唐宋時期之出版事業，然於整體規模與成就方面卻是不及宋代之發展；明代則由於活字版印刷術之漸趨普遍，從而造就出版事業空前繁榮之景象，惟質量良莠不齊，屢為學者所詬病；清代前期之屠城政策與文字獄於一定程度阻礙出版事業之開展，主要是以木質與銅質之活字版印刷術為其特色，後期則傳入西法印刷術。最末，初步說明宋元版漢籍於年代、數量、品質等方面之珍貴價值，而一衣帶水之日本自古即深受中國文化所影響，尤其漢籍擔負有傳播文化之重要使命，長此以往，日本遂成為域外存藏宋元版漢籍最多之國家。若是，日藏漢籍不僅得以反映古今兩國之交流情形，亦為中國歷史與文化提供另一種認識之可能。此外，於論述中國雕版印刷術發生年代之際，作者曾舉最古之印刷品日本百萬塔《陀羅尼經》為例，藉此佐證日本印刷《陀羅尼經》之背景當是由朝鮮引進中國之技術。顯示中、朝、日之關係密切，如此，則可以透過漢籍之流布考察文化傳播所造成之影響，以廣泛流傳於朝、日之《古文真寶》為例，何以《古文真寶》能夠廣泛流傳於朝、日？而朝、日個別接受《古文真寶》之文化背景為何？且對官方取士是否造成某種影響？於思想內容與體裁形式方面又個別對朝、日之文學與文化是否產生過某種刺激？諸如此類，皆值得學者一

臺灣古典藝術期刊資料庫

窺究竟，經由深入發掘與比較以進一步探析文化之影響與形成。

於第一章〈歷史的回顧〉。首先，作者通過紙上文獻——正史典籍——與地下材料——具吳國紀年之面文帶神獸鏡——證明中日交流淵遠流長，接著說明漢籍被大量引進日本之深層原因，乃是由於日本當時之發展遠不及中國，實則，自西元一世紀前後漢字傳入日本以降，即對日本語言與文化之發展造成刺激，從而加快日本社會趨於成熟之進程，自然對漢籍之需求亦是與日俱增。其次，再進一步聚焦於隋唐時期，說明使節與留學僧為漢籍東傳所作出之貢獻，不僅止於此，當時亦有渡日之中國僧侶，除漢籍外，復將建築與醫學等相關技術引進日本。估計隋唐時期日本聖德太子所訂定之「冠位十二階」制度與《憲法十七條》便是產生於此密切交流之歷史背景底下，同時亦足以窺知中國文化對日本所造成之深刻影響：「冠位十二階」制度將官階分為大小「德、仁、禮、信、義、智」十二等，乃是受儒家思想所致，而以之擬配深淺「紫、藍、赤、黃、白、黑」十二冠，則疑似染有道家之色彩；《憲法十七條》更廣泛吸納儒、法、佛、道、墨等各家之學說，為此，作者特別列表以資對照，藉以突出中國文化於《憲法十七條》之影響軌跡。由是觀之，在在顯示漢籍之流布乃是散播文化之重要形式。此外，據中日僧侶之頻繁交流與《憲法十七條》中「內儒外佛」之現象而論，皆展現出佛教文化對日本之影響甚鉅，此蓋與當時中國三教合一之發展有關，然何以佛教文化能如此深入日本王室，並成為法令之重要組構元素，且用以規範君臣與臣民關係？似與佛教之出世思維有所牴觸，此或許不失為日藏漢籍研究可以賦予關注之一大面向。最末，作者將日本平安時代藤原佐世編撰之《本朝見在書目錄》與稍早之《隋書・經籍志》相互參照比較，認為前者之編撰乃是模仿後者而成，同時亦藉以彰顯隋唐時期以前漢籍東傳之狀況。其中尤以醫方家、小學家、五行家三類漢籍為大宗，足見早期日本對中國文化之吸納取向，而易家、論語家、儒家、道家等思想類漢籍與別集家、總集家等文學類漢籍，作者皆有列表進行部分呈現，不難窺知當時漢籍東傳之規模。其中小學家一類除收錄文字與音韻之相關漢籍外，亦雜有書法與詩文評等性質之漢籍，可以想見日本文藝觀之發展相當早，若此，漢籍又是如何影響日本文藝觀之形成？此一課題確實值得深入觀察。

而第二章《宋元版在日本的流布》，則進一步聚焦於包括遼、西夏、金時期在內之宋元版漢籍以進行相關闡述。首先，作者說明宋代初期出版事業之所以蓬勃發展之歷史背景，不僅與「抑武重文」之政策有關，宋室亦廣為搜羅天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下逸書，並陸續推動《大藏經》、《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大部頭典籍之編撰工作，遂開啟兩宋出版事業之繁榮景況，同時造就字體多樣、避諱嚴謹、重視刊語、講究規矩等鮮明特徵。隨後簡要敘述遼、西夏、金時期出版事業之大致情形，儘管介紹內容十分有限，但卻是值得關注之重要面向。接著作者對元代出版事業之成就進行評斷，認為元室缺乏出版熱情，一定程度對元代出版事業之開展造成妨礙，元版漢籍雖不如宋版漢籍精美，然元版漢籍是對宋版漢籍之直接繼承，故往往具有高度之歷史與學術價值而深受青睞。其次，作者進一步陳述宋元時期漢籍東傳之情形，無論是裔然、成尋、榮西等訪宋日僧，抑或是蘭溪道隆、大休正念等訪日宋僧，著實皆為宋版漢籍之東傳作出貢獻，而元代儘管雙邊關係較為緊張，然僧侶與商人仍舊是重要之交流媒介，同時作者引述江靜之觀點說明元代兩國商船往來之頻繁程度已至令人咋舌之地步。最末，則強調日藏宋元版漢籍之數量豐富，其中不乏天下之孤本，足見日藏漢籍之非凡地位。此外，日藏宋元版漢籍東傳之途徑亦不盡相同，作者特別歸結出三項主要來源：（一）宋元時期經由僧侶與商人直接攜入者。（二）從朝鮮傳入或強取者。（三）明清以降獲取自中國者，此尤以靜嘉堂文庫於清末購入陋宋樓一大批宋元版漢籍至為出名。由是觀之，亦足以啟示學者就日藏漢籍展開影響論述之際，必須先行釐清日藏漢籍東傳時間之可能區段，以免是進行早期影響探究卻把晚期方才東傳之漢籍列為證據，如此張冠李戴勢必將作出錯誤之推斷。再者，根據作者之相關論述，實不難窺知隋唐乃至於宋元時期僧侶對漢籍東傳所作出之卓越貢獻，或許可以藉此深入探究唐宋之際中日詩僧群體於哲理或詩藝之交流狀況，並通過參照比較與影響分析之細部觀察，以增進對兩造之瞭解，甚至得以交互填補發展上之空白，諸如九僧之屬，於相關史料十分匱乏之情形下，經由日藏漢籍此一管道進行考察，不失為研究工作之一絲希望，儘管於此課題仍舊可能無所解答，然至少尚足以對九僧所處時空關乎詩僧活動之資訊有所掌握。歌德云：「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其實什麼語言也不懂。」故惟有將我者與他者兩相參照，方能對雙方產生更深一層之理解。如此，日藏漢籍確實值得學者仔細發掘。

至第三章〈宋元版在日本的藏存〉。作者先大致羅列出日藏宋元版漢籍之書目概況，且按經、史、子、集個別進行呈現，接著於宋版與元版各揀選出二十五例以為相關之內容說明。若結合本書〈附錄〉所列二百餘例以觀之，將更能對日藏宋元版漢籍取得基礎性掌握。此外，由是諸例之相關內容說明亦不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覺，日藏宋元版漢籍藏存有不少全本與善本及孤本：全本得以彌補殘本之不足或收錄有它版所未載之文字，《集韻》、《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等屬之；而善本有益於顯現著作之原貌，《歷代地理指掌圖》、《初學記》等屬之；孤本之碩果僅存則尤為珍貴，《崔舍人玉堂類稿》、《誠齋先生南海集》、《姓解》、《新編醉翁談錄》、《重廣會史》、《花果卉木全芳備祖》、《孝經直解》等屬之。又若上述之《歷代地理指掌圖》乃中國地理學之重要文獻，有助於地圖發展之理解，《姓解》則保存中國姓氏源流之概況，《新編醉翁談錄》得見小說與戲文等足以反映宋代俗文化之相關訊息，凡斯種種，不僅在在顯示出日藏宋元版漢籍之歷史與學術價值，且其所涵蓋之文化面向十分寬廣，亦足供學者於此拓展愈多之研究可能。作者復於章末另闢一節，藉以對日藏宋元版漢籍之保存單位進行概要介紹，其中包括靜嘉堂文庫、宮內廳書陵部、天理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公文書館、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金澤文庫、真福寺、奈良興福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成簣堂文庫、尊經閣文庫、蓬左文庫十五處重點單位。有助於對首度接觸日藏宋元版漢籍之學者建立基礎性認識。

於第四章〈日藏宋元版的地位及其影響〉，作者乃就日藏宋元版漢籍之地位、研究、和刻、影響四大面向進行闡述。首先，作者指出宋元版漢籍於日本之地位相當重要，日本將之視為珍貴之文化遺產，尤其日藏漢籍之流傳久遠，過程中甚至可見日人評點之文字或筆記，深具研究價值，足以透露出文化傳播或形成之影響或接受進程。其次，則列舉長澤規矩也與阿部隆一兩位相關學者以說明研究之概況，前者於日本各地廣為查訪，而後者展現出梳理中日宋元版漢籍之決心，得以略見二人之考據功力與嚴謹態度。再次，作者特別將日本複刻或複印宋元版漢籍之現象凸顯出來，無形中亦對保存漢籍內容有所裨益，而此一現象之發生實與日人圖書需求之增加有關，尤以「春日版」、「高野版」、「五山版」至為知名，其中亦有不少中國移民參與刊刻。前年所編選出版之《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即屬此類，儘管尚未搜羅備至，然數量業已相當龐大，的確不難想見背後之文化影響何其複雜。最末，是關於宋元版漢籍與和刻本所呈現之文化影響論述，作者以宋刻蜀版《大藏經》、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朱子學為例，說明東傳漢籍於佛、道、儒思想方面曾帶予日本文化十分廣泛之影響，此外，復舉日本能樂為例，謂之於形式與內容皆與隋唐宋元文化密切相關，在在顯示漢籍東傳除對日本出版事業產生重要影響外，對日本文化精神生活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更是極其深刻而久遠。

〈結語〉方面，作者特別提出四項補充說明：其一，於漢籍東傳之過程中，日人對漢籍之接受有其認識理解乃至於消化吸收之進程，故藉之以深入考察中日文化異同之意義十分重大。其二，由於元版漢籍存有複刻宋版漢籍之現象，故欲辨析宋元版漢籍之歸屬不易，尤須備加謹慎。其三，古代漢籍之藏存亦得進一步佐證裝幀技藝之發展情形。其四，有關日藏宋元版漢籍藏存之經歷可藉印影、跋文、識語等進行推測。對於第四項說明，的確不容忽視，尤其是影響觀察方面之研究，必須特別留意。最末，作者總結出三大面向：（一）日藏漢籍反映中日悠久之交往歷史，且日本文化之形成深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惟日本文化仍舊保有自身之特色。（二）自隋唐時期之官方交流至宋元時期之民間交流，著實為漢籍東傳提供有利之條件，故而間接導致日藏漢籍存有不少天下孤本，成為中日兩造極其珍貴之文化資產。（三）透過東傳漢籍足以窺知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之深刻影響，然而中日交流之淵遠流長絕不可能是單方面之影響，因此，亦應當適度重視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之影響。關於第三項意見，相當值得學者省思與警惕，以免造成研究之片面性呈現，從而使視野僵化，造成許多拓展之可能性遭致忽略。

作者總覽式地對日藏漢籍進行深入淺出之要點掌握，並聚焦至宋元版進行考察，層層推進而結構完整，不僅羅列部分書目，亦對重要之藏存單位有所介紹，皆足以發人深省。此外，本書復有以下三項優點：（一）於論證方法上，講究紙上文獻與地下材料之結合。（二）對中日交流進行溯源，使歷史脈絡愈顯清晰。（三）製作簡表以資參照與理解。而本書較為可惜之處，乃在於作者對遼、西夏、金時期與元代出版事業之情形及漢籍藏存之說解過於疏略，不禁令人懷疑元代漢籍之東傳，是否曾經連帶導致異族文化對日本產生影響？抑或是日本文化對元代造成影響？又本書深具啟發性，前文雖已多所陳述，然於此不妨再稍作說明：（一）據作者所列書目觀之，得見藏存有不少詩話，而日人所著之詩話亦多，如此，則中日詩話之關係究竟為何？對同一課題之觀點有何異同？然無論異同，皆必須進一步探析其排拒與吸納之深層文化因素。（二）日人對漢籍之評點於一定程度透露出當時個人或群體之文化取向。（三）關於漢籍對日本文藝觀之形成，可以與日本同時期之圖像及文物參看比較，藉此相互印證以釐清論點。總而言之，本書通過對日藏漢籍之觀察，不僅強化對彼此關係之重新理解與認識，更使得研究視野大開，從而激發出許多不同思考面向之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